

张涤生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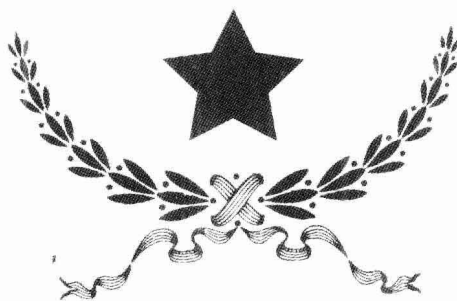
共和国院士 回忆录 (二)



张涤生	俞大光	尹文英	俞鸿儒	王梓坤	梁敬魁	王佛松
王 迅	高庆狮	钱清泉	汪忠镐	曾溢滔	朱英国	李洪钟
李曙光	杨雄里	黄纬禄	徐叙瑭	夏培肃	刘源张	张友尚
陈宜张	赵尔宓	干福熹	山 仑	林宗虎	汪集暘	姜文汉
李鹤林	杜祥琬	顾金才	邱定蕃	王恩多	魏寿昆	申泮文
高 鸿	陈述彭	陈秉聪	黄本立	孙 钧	傅依备	邱蔚六
丑纪范	石玉林					

张涤生 等著

共和国院士 回忆录 (二)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院士回忆录.2/张涤生等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3

ISBN 978-7-5473-0468-6

I. ①共… II. ①张… III. ①院士—回忆录—中国—现代 IV. ①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938 号

共和国院士回忆录.2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17.25

印 数: 0,001—3,25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68-6

定 价: 35.00 元

师长高风

张涤生：记我的初中老师严济宽和高中老师徐承谋	3
俞大光：我最敬仰的赵师梅老师	7
尹文英：记引领我入门的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	15
俞鸿儒：师长的教诲	20
王梓坤：白鹭洲求学记	
——缅怀顾祖荫校长、高克正老师	26
梁敬魁：回忆我的老师卢嘉锡、阿格耶夫、陆学善	30
王佛松：难忘我的老师黄仲韬、多尔哥普罗斯克	36
王 迅：我的大学老师们	40
高庆狮：感恩我所有的老师们	44
钱清泉：良师益友·大师风采	
——谨以此文缅怀已故铁道电气化先驱曹建猷	48
汪忠镐：一代宗师曾宪九、裘法祖	53
曾溢滔：我的老师谈家桢	58
朱英国：我的恩师胡建文	62
李洪钟：引导我进入科学殿堂的三位名师	69
李曙光：追忆好友孙贤铤	75
杨雄里：托体同山阿	
——纪念冯德培院士百年诞辰	82

天伦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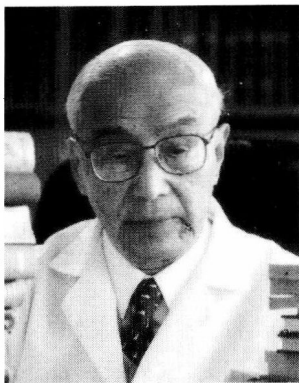
黄纬禄：我的孙子豆豆	89
徐叙瑛：家庭往事	96
夏培肃：我的母亲黄孝永	102

刘源张：我的外祖母·我的大女儿·····	108
张友尚：怀念父亲张孝骞·····	117
陈宜张：记我的父亲和两个叔叔·····	121
赵尔宓：怀念爱妻涂茂涸·····	126
千福熹：科研苦旅	
——我和妻子邓佩珍科研生涯的欢乐和悲痛·····	133
山 仑：母恩难忘·····	140
林宗虎：怀念母亲吴锡珍·····	145
汪集暘：忆我的父亲母亲·····	150
姜文汉：“成就和荣誉中有你的一半”	
——记我的爱妻凌宁·····	153
李鹤林：感恩两位女性——我的慈母和爱妻·····	158
杜祥琬：我的家庭·····	163
顾金才：对母亲的回忆·····	171
邱定蕃：感恩亲情师情·····	175
王恩多：我的母亲赵湘因·····	180

人生感悟

魏寿昆：奋斗人生·····	185
申泮文：我的翻译生涯·····	194
高 鸿：我这一辈子·····	205
陈述彭：独肾米翁别传·····	209
陈秉聪：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	218
黄本立：我的后半辈子·····	222
孙 钧：八秩虚度感怀·····	227
傅依备：我的成长历程·····	233
王梓坤：豪情尚在话当年·····	239
邱蔚六：一次灾害医学的实践	
——忆 7.28 唐山大地震·····	245
丑纪范：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有感·····	256
石玉林：难忘的科学考察生活·····	259

师长高风



简介：

1916年6月12日生于江苏无锡。医学专家。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上海市整复外科研究所所长，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院长、整复外科主任，中国修复重建外科学会主任委员，第三届世界美容外科学术会议主席。

主要成就：

中国整复外科创始人之一及开拓者。20世纪60年代在国内首先开展显微外科动物实验，创制治疗肢体淋巴水肿的烘疗机，并在70年代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在国内外首创前臂皮瓣一期再造阴茎手术，距趾关节移植重建颞颌关节强直等手术。在国内首先开展游离肠段移植再造食管，大网膜游离移植治疗颅骨暴露坏死等手术，并开展颅面外科，胸骨裂心脏外露等首创性手术。

张涤生：

记我的初中老师严济宽和高中老师徐承谋

那是1929年夏末初秋，我考入了无锡县立初级中学，学校在宁静肃穆的学前街上。说它宁静，因为那是一个学校区域，对河是当时知名的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左侧是江苏省国学专科学校，而县初中左邻就是无锡县的孔庙，平时很少有人去，被一派肃穆宁静气氛笼罩着。学前街只有清早开校和放学时刻才出现一番热闹活泼的景象。

我在县立初中度过了整整3年的学习生活，在那3年中，我先后曾受到十多位老师的教导。但在我初中时期，受益最多、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语文老师严济宽先生。严老师连续两年教我们语文课。他浓眉大眼，个儿较高，平时戴一副深色的高度近视眼镜，经常穿一件暗色的长袍，讲着一口带有宜兴口音的乡音，脸上永远挂着微笑，很有风度。

记得那时的初中语文课本只是薄薄的一本书，内容并不丰富。严老师上课时都很少要我们翻书本，他也从不照本宣读，却用大部分时间给我们讲

“故事”，给我们介绍很多古典文学和当时流行的新文学作品，布置我们阅读许多课外读物。他先从《古文观止》上指定不少文章要我们精读和背诵，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李密的《陈情表》、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文章有的热血沸腾，有的意境深远，有的词藻华丽，在我幼小的头脑中曾引起了不小的触动，迄今难忘！他后来又介绍我们读鲁迅的《阿Q正传》，冰心的《寄小读者》，又要我们读巴金著名的三部曲的首部《家》，以及英、法、俄许多著名作家的新小说，甚至新苏联时代的不少作品。

记得在那一年时光里，我们竟然阅读了当时世界上许多大文学家的名作，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莫泊桑的多篇短篇小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以及旧俄时代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和苏联时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当然，中国的不少新文学作品也是少不了的，当时我们已熟悉了茅盾、老舍、冰心等新文学作家。更令人难忘的是那个时期苏联正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他竟然在课堂上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情况。现在我回忆起来，这么一位传统和先进思想并存的好老师，居然屈居在一个初级中学当语文老师，真有些大材小用哩！

从我自己来说，我从小喜爱读书，小学时期，我已遍阅了许多古典小说，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等，还有就是边读边害怕的《聊斋志异》，更不用说《七侠五义》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海派小说了。故此，有了这位严老师，我读书的劲儿就更大了。可能也是由于阅读量太大，用眼过度，初中二年级，我便戴上了近视眼镜。

第二年初二了，他随班继续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啊，那以后他居然给我们介绍唐诗宋词来了。唐宋诗词的确大大丰富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开阔了我的思想眼界。我特别喜欢李煜和李清照的诗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它们表达着多么深沉的亡国丧家的哀怨和痛苦啊，真是绝世佳作、千年难得呀！后来他更介绍我们读有关戏剧和音乐的文字，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到当时田汉、老舍等中国老一辈戏剧家的新作品。这时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提高了，曾布置作业要每个学生试写一个独幕剧。他还曾要我们写一篇杂文，我回家思索了一番，试笔写了一篇回忆性短文：当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两年时间里，我曾随父母亲去天津住了两年，就读于法租界西开小学，后来又随父母返回无锡定居，初回无锡时觉得故乡变了，竟是那么古老和破旧，让我很失望和无奈。在文章最后，我写道：“经过思索，家乡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之所以感到家乡变了，事实上是故乡依旧，而我的意识变了，我的心情变了。”这是我模仿鲁迅的杂文《故乡》而套用的话！严老师大加赏识，认为写得很好，竟然要我在课堂上向全体同学朗读，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严老师连续两年教我们语文课，给我介绍了许多中外古今名著，开阔了我的眼界，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播种了爱国进步的种子，特别是培养了我的写作能力，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虽然没有成为作家，但在我从医后，在医学专业领域里，我先后出版了十多本中外文的

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论文，出版了两本传记类图书和许多篇科普杂记等文章，也可以说是一位多产的医学家了。是哪位老师赋予了我写作的能力呢？我想还是应该首先归功于这位严济宽老师吧！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私立无锡中学，学校在无锡城南大运河边，是当时江苏著名教育家高践四先生（也是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的建校教育家之一）殷家兴学而创建的，在当地很有名望。这个学校拥有初高中部，是一个完全中学。高中部的特点是英语特色。在高中部，除了语文、中国史、地理等课程外，其他化学、物理、数学（包括代数、几何、立体几何）等学科都清一色地使用原版英语教材。进了这么个以英语为主要读书工具的高级中学，可难为了我们这些在初中时期英语课并不是主要科目的学生了。回忆起来，我当时情绪十分紧张，生怕一旦英语课赶不上就得留级，而留级是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啊，不但自己脸上无光，对十分关心培养我成长的父母亲来说，更是耻辱！

但我们真是一群幸运的孩子，我们又有了一位好老师徐承谋先生来教我们英语课。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英语基础扎实，教学方法循序渐进，很有教书育人的才华。当时用的英语教科书是《泰西五十轶事》和《泰西三十轶事》，分别在高中一、二年级攻读；此外在文法方面，教材是原版的 Nesfield English Grammar。这几本教科书收集了西方各国各类的名作和短篇。徐老师将每一篇文字朗读和解释给我们听，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没有几个星期就使我们学习外文的恐惧心理一扫而光。不久以后，读英语课文就成为我的一种享受和爱好了。他也经常指定要我们背诵多篇名作，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美国林肯总统的 Gettysburg address，以及其他名家文章，如：Too dear for the whistle。（我已忘记作者是谁，但这篇文章教导人们在做人做事任何方面须“勿言过其实，适可而止”的做人道理，令我迄今不忘。）

经过徐老师一年的教导，我在期终考试中，英语不但及格而且名列前茅哩，也从此奠定了我的英语基础。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参加印缅远征军，常和美国军医打交道，在一起做救死扶伤的工作，我的英语水平居然和那些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的翻译官差距不大！战后，我又去了美国读书进修，英语的听、讲、写能力更有了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以后，我开始打开我从事医学专业的国际交流平台，获得了声誉，靠的是什么？一是专业成就，二是英语水平！我想要不是徐老师在我高中时期为我打下了英语基础，我就不可能在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里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学术领域里为祖国获取荣誉。

在我这一生中，曾先后受到无数老师的教诲和指导，但从打基础方面来说，初高中时代的这两位老师才是最谆谆善教、授我以渔的好老师。一位帮我把中国文学基础打好，打结实，另一位授我以外语方面的开门钥匙。他们都是我青少年时代，在我头脑里深深种植下中外文化种子和精华的恩师，使我受用了一辈子！我没有使他们失望！他们可亲可爱可敬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参加博士生毕业典礼(2002年)

人们知识和技能的累积,不外有三个途径:老师、书本和实践。“三人行,必有吾师”要虚心向,勿骄傲自满。广读群书是求知之道,科技信息是创新之源。技能来自实践,人们在不断实践中探索、提高和开拓。从老师和书本中得来的毕竟有限,而在我们头脑中蕴藏,有待开发的,却永无止境。

张泽生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二日



简介：

1921年1月22日生于辽宁盖平(今盖州),湖南长沙人,祖籍浙江绍兴。理论电工与电子技术专家。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195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班毕业。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设计部副主任、电子工程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

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工基础课程建设中起了开创性作用。领导设计中国第一代核武器引爆控制系统和遥测系统,完成4个型号引爆控制系统的定型。担任中国一个战略核武器型号的第二总设计师及其核战斗部的总设计师并完成定型。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定型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俞大光： 我最敬仰的赵师梅老师

赵师梅老师是我国有名的教育家,早年曾参加辛亥武昌首义。1940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后不久就认识他。那时他是武汉大学的训导长和工学院电机系主任。我被录取在工学院,第一学年不分系,从1941年秋季学期我被分到电机系起,就一直在他的直接教育下完成了学业。大学毕业后我曾留校任教6年,仍继续得到他的教导和关怀。新中国成立后电机系主任职务已转由叶永竞教授担任,他也是我敬仰的老师之一。1950年秋,我被派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苏联教学经验,1953年结业后即被高教部指名调往该校,就这样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母校武汉大学和敬仰的老师们。

然而,在那约十年受赵师梅老师的教导和关怀的时间里,我也和很多同学及同事一样,对这位受尊敬的老先生、老教授的事迹并不清楚,只是道听途说。他曾参加武昌首义;而我们很多人都听传说认为他是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他十分平易近人,我们电机系同学常相约三五人到他住宅叩访,谈话都很

随便。有时他还拿出从巴东老家带来的核桃让大家品尝。但当我们问起他参加起义之事时,他总是不肯透露,或者草率接话,或者转而言他。他对自己的功绩总是讳莫如深。另外当时他已年近五十,仍过着独身生活,是何原因?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未便询问。有些好心的同学出于爱师,曾据传说为先生杜撰了一篇与实情有些相似的凄婉的爱情悲剧故事,广为流传,但毕竟并非事实。

1962年,我又从哈工大被中央组织部指名调到现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一直干到1991年退休。在这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工作繁忙、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等原因,使我未曾回过母校,只参加过几次成都校友会活动;但从与个别校友的通信中已获悉恩师赵师梅教授已于1984年辞世。我退休后不久就传来了联名发起设立赵师梅教授奖学金基金的倡议,我欣然参加并作为发起人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和募捐,在庆祝武汉大学90周年校庆时(1993年11月),基金会在华中工学院^①成立。翌年即开始每年给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和巴东七七义立小学(赵师梅先生于抗战开始那年兴办的)三校中的极少数贫困而学习优秀的学生评发奖学金。由于基金额度有限,开始是利用利息发放奖学金,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不得不动用基金本金。这样还能维持多久,尚无所知。大家在筹办奖学金的同时,还有另一想法,即编写出版一本赵师梅先生传,用以宣传恩师生平事迹,用他无私奉献一生的高贵品德来教育后代。这事经与恩师赵师梅的堂弟、华中工学院的赵学田教授(也是我在武大学习时的老师)商议后由他收集资料,由我和武大电机系校友、华中工学院陈锦江教授执笔完成。那时我虽感到任务不轻,但还是愿意承担,因为通过这项工作可以首先获悉在恩师面前未能知晓的情节,并通过传记的出版让渴望清楚了解恩师事迹的同学们知晓。编完后,感到内容虽丰,但由于知之不详而篇幅较小,故决定改称“传略”,同时又收录他的诗文和他亲人、同事和学生的怀念文章,共11万多字成书,后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赵师梅老师事迹概述

正义,爱国

赵师梅老师早年痛心于清政府的腐败懦弱、民族备受帝国欺凌、国家走向灭亡的形势,奋起参加辛亥革命。他坐过牢,上过战场,流过血。推翻满清政府后,他被评为甲等勋功者,被中山先生选派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他目睹军阀混战无已、人民痛苦依旧的状况,不屑于在京做官获取厚禄,而宁肯终生潜身清门从事教育,并从不与人谈及参加辛亥革命之事。在他二三十年代的遗诗中,可多处读到他痛斥军阀、忧国忧民的句子。

^① 武汉大学在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已将机械、电机两系全部调动到华中工学院,后改称华中理工大学,近年又改称华中科技大学。

抗战时期，赵师梅老师在家乡向乡亲们宣传抗日，经常对抗日军人家属提供经济支持。他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称作“七七义立小学”，用一个日寇的炸弹壳做钟，以加强师生的抗战意识。他自己还作了打游击的准备方案。

抗战胜利后，赵师梅老师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当政府派军警到武汉大学逮捕进步师生、制造枪杀三学生的“六一惨案”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领衔署名公开发表文告，揭露惨案真相，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师生。当时正值著名学者闻一多、李公朴在街头被特务暗杀后不久，所以他的行为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

武汉临解放前，赵师梅老师支持武大周鲠生校长抵制政府要求迁校的决定，主持应变委员会，组织联防护校工作。应变委员会是由各群众团体——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工友会、学生会等派代表参加，研讨并决定各项应变计划和实施方案的临时性组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该会第一个决定就是囤粮并发到各家各户和各集体食堂。师梅教授率领着印刷厂肖洁厂长四处奔波，购回足量的稻谷和面粉并及时下发，对安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临近解放的时段，在中共武汉市委武大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暗中领导下，组成的“武大安全互助团”实际上也是应变委员会的扩大。几个月的坚持，使抵制迁校和护校保产都圆满完成。

劫难面前不丢原则。新中国成立前恩师当过大学训导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免不了挨批斗。他被抄家、被关进牛棚，成为武大工学院头号“牛鬼蛇神”。在一次批斗中，当他被问道：“你是否说过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斗争太残酷的话？”他答道：“说过。”又问：“你现在是否还是这个观点？”他答道：“是。”于是问者就冲上去给了他两个耳光。他虽受凌辱但没有丧失原则，而问者的粗暴行为却恰好证实了恩师的观点正确。

鞠躬尽瘁，顾全大局

师梅教授遵照中山先生的旨意，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创办了湖南大学电机系和武汉大学电机系，担任过电工原理、交流电路、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电仪与测法、发电厂、电工学等多门课程的讲授，十分熟练，学生们曾打趣他讲课像开机关枪似的。他还十分热心公务。一方面当教授和系主任，而学校每有大事也常常请他负责。武汉大学建校时的水电工程是由他设计和指挥施工的。抗战时期校舍被日军用作医院，水电系统、教室、实验室和宿舍都受到严重破坏，他又被派先期去那里负责接收和修复工作。这工程量大而人手缺乏，且生活艰苦，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按时完成了任务。他工作头绪很多、很忙，但从不在人前说一个忙字。只要工作需要，从不因忙而推脱。他常讲：“我赤身来到人间，我的一切是人民给的，我的一切也要为人民。”

我和当时在武大的许多同学一样，对这样好的老师曾在武大当训导长很不理解，直到准备写他的传记时才弄清楚。原来这正是他顾全大局不计毁誉的表现。20世纪3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为了管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责令在高校设置训导处和训导长，后者一般由政府派

人担任。当时武大王星拱校长力主学术自由,要让各派思想在学校兼容并蓄,而校内进步思想十分活跃,学生办的各种壁报异彩纷呈。王校长了解师梅先生乃国民党元老,又一贯不同意政府的倒行逆施,而且十分关爱青年学生,因此认为只有推荐他出任训导长才能渡过难关。他知道出任训导长将承受来自政府的压力,又将受到同事们特别是学生们的误解,毁损自己的声誉,因而回避了一段时间。后来王校长通过他的堂弟赵学田教授转告他,如果他不承担,就可能有个特务或党棍被派来学校,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师梅教授还是顾全大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答应了下来,担任了四年训导长。

师梅先生常以顾全大局来教导学生。现举一例。当时的武大只有一个简陋的校医室,仅有一位校医,八小时工作制,薪俸微薄,下班后还得自己开业。某夜一学生患疟病(四川乐山的地方病,患者全身发软,难以救治,重者危及生命,后经研究认为乃井盐中含氯化钡使人中毒所致),有同学去校医住宅要求出诊,被其家属以劳累回绝,次晨患者不幸死亡。同学们悲痛之余,除报告学校外,有两个火气大的同学去校医家砸了门窗,又去校医室砸了牌子。事后校医向学校提出严重抗议,并要辞职。校医经校领导安抚和朋友劝说,虽勉强同意留下,但要求查处肇事者并向他道歉。面对这一难题,师梅先生利用早操后的时间集合讲话。他说:“同学们的激动心情可以理解,但行为粗暴,已造成不良后果。学校医疗条件差,校医仅一人,众多员工和学生中谁有病都离不开他。为此事件,他要辞职。请肇事者听着,为了大局,你们必须承认错误,接受处分并向大夫道歉,挽回影响。砸坏的门窗要修理,校医室的牌子要重做。我信任你们有血性有志气,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在办公室专候。”话虽短却很见效,当天就有两名学生受到感动,到师梅先生办公室“自首”了,此中也许还捎带有师梅先生已在青年学生中树立起较高威信的因素。从此矛盾逐步化解,广大学生也受到了教育。

和蔼可亲,乐于助人

师梅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学生都愿与他接近,在接近中受到他的教诲;他也在与学生的接近中对学生有更多了解。在学生中普遍印象很深的是他很注意德、智、体三育间的差异。他多次说过:“品德问题是别人要给你记账的。个人的坏毛病不仅难改,即使痛下决心改了,别人还是会记得你曾犯过某种毛病。业务知识也很重要,但只需自己记账。你一课没学好,甚至未考及格,只要你努力赶上,甚至超过一般,别人是不会再记住你以前曾经不及格过的。所以品德修养比业务水平更重要。体质则是老来要算总账的。年轻时不注意锻炼身体,生活无规律、经常开夜车,暂时看不出问题,而人到中年未老先衰,五十多岁就疾病缠身,什么理想、抱负也都将化为乌有了!”恩师就是这样教育学生,而且身体力行,用行动做大家的榜样。

他生活十分简朴。节俭下来的钱除在家乡办起一所小学外,还大量用以帮助贫困学生,使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受助者感恩不尽,毕业时一一到他家辞别;有的还跪下谢恩,并承诺将来还钱。恩师总是说:“钱不用还我,你有能力也资助几个贫困青年上学,就算还我了。”他

不仅对学生,当同事有难处时,他也总是伸出救援之手。武大西迁乐山时,有位机械系老师在赴校途中不幸遇匪劫,行李财物被抢一空,到校后不知所措。师梅先生把他接到家食宿数日,并带动几位同事协力为他解决了衣食住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师梅先生所在单位年轻人较多,当时实行低工资制,家庭负担重者也常遇到困难。为方便帮助同事克服困难,他索性把自己的存折放到单位,谁有急需径自取用,归还之事他从不过问。

受恩师教育的体会

恩师赵师梅先生的教诲体现在做人、治学和办事的各个方面,使我受益终身。遗憾的是恩师的事迹有许多我在 20 世纪末尚未得知或未知其详。现对照我的所思、所做、所为,写出以下几点体会:

当今世界,成就事业一般都要经历风险

社会要前进,就要不断改造和变革,就会出现矛盾和斗争,就会有风险。师梅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维护武大的思想自由都经历了巨大的风险才取得了成就。推及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办企业就有竞争,优胜劣汰,必有风险。搞科技研究有成败的风险,也有事故的风险。虽然风险大小不一,但完全没有风险的事很难找到,即令找到也难以从中获得大的成就。

1962 年,我被调到现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通过自己的经历体会到这点。首先是事故的风险。核材料有放射性,核武器引爆要用炸药,因而在加工、装卸、实验过程中都有出现事故的概率。参加这些工作的人员中,确实就有极少数人因事故受伤,也有几个人牺牲,至今令人怀念。有次我在装在实验台上的核炸弹准备进行振动试验的现场,测试人员忽然发现厂房内不但在弹壳上,而且在暖气片上都能使试电笔发光,这现象引起了一场虚惊。因为当时炸弹内装的是敏感度高的火花隙雷管,虽然核材料是用惰性材料模拟的;但其中的炸药如被雷管引爆,其毁伤半径也将近千米。有我在内的实验领导小组紧急商定试验暂停进行,只留少数人查找未明现象的原因,其余人员一律到千米以外待命。幸而只过约半小时原因即查明,乃参试人员着胶底鞋与场地铺设的橡胶垫相互摩擦之故,基本未影响工作进度;但与我同留在现场查找原因的同志们,显然都承担了风险。

我们的核武器研制事业起步时还需承受另一类风险,即国际间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风险。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使我们不得不改变策略,自力更生,摸着石头过河。当我们在中央政府指挥、全国各方大力协同下完成了设计和试制,准备外场试验之际,又遇到美国的核讹诈,扬言要对我国进行核绝育手术。为了防范万一,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复制所有的重要资料并易地秘密安全储存;疏散不影响后续主要任务的人员。当时一部分人员去基地参加试验,一部分人员疏散后,院设计部原共六位业务领导只留下我一人负责,不但要承担来自核讹诈的风险,也还要承担业务上的风险,好在

我们最终顺利度过了那段时间，不到两个月就迎回了胜利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试验大军，疏散的人员也适时返回了。

这里陈述的风险显然比不上师梅先生曾经承受过的巨大风险，有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只能说是给了我们一点初步考验。

大力协同、顾全大局是完成好大型工程项目的必要条件

1962年，毛泽东主席曾给我国两弹一星项目做过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上面我师梅先生为顾全大局的典范事迹，也是大力协同的出色表现。我们研制的核武器，主要为了装备导弹，因此技术上首先要与导弹适配良好，为此在着手研制前就需密切协调；而核武器内部也包含多个环节，需要多方交错协调。协调既商定分工，又商定相互技术数据和要求，故必然涉及各方分任务的难易差别、留有余量的多少、承担风险的大小和如何解决尚存问题的途径等。为了协调和谐进展，必须要求参与协调的各方都能顾全大局，因此大力协同的风格是十分重要的。但还必须让参加协调的人员都能对大局了解。只有对别人的工作和难点都有大致的了解才有可能做到大力协同。我担任过型号总设计师，主持和参加过多次内外协调，为此也需要在协调前做好充分准备，并在协调过程中多次陈述相互了解、顾全大局的必要性才能有所进展。

大力协同的风格应该体现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师梅先生作出的榜样就是如此。我们在技术协作中提出的口号“有问题共同讨论，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应该说这只是起码的要求。如果每位参与协调者都能按此口号去做，协调也就必然能够和谐地进行了。

以恩师德、智、体三育属性为座右铭

这是恩师赵师梅给予我们的重要而简捷的教导，大多数同学都能铭记心中，也在我的毕生经历中得到普遍应验。德首先应体现在诚信，这是处理好人际关系、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在哈工大跟苏联专家学习时，专家给定翻译苏联教材为学习任务。我在译到有体会之处就以脚注形式添加译者注。但有处译者注中推导有错误，经参译者相互校阅两次均未发现，文稿后的审阅亦未发现，因而存留在已出版的书中。译书出版后，一位武大学长（也是我的好友）在与我的通信中谦虚地向我提出问题之所在，经我考虑后才恍然大悟。怎么办呢？错了必须承认并及早纠正为妥。于是我即时拟定改正文字并函告出版社，要求在下次重印时予以改正，后已按要求做到。想不到时过四十余载仍有人读到我的本译著的初版书，发现了该错误，其旁恰有一位武大电机系校友，当面告诉他可能早有改正过的新版本了。随后该校友向我函询，才敢肯定它原来的估计是正确的。此事不大，但反映出能否知错就改，那就是品质问题了。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出于恐惧心理，将我的国民党党证烧毁。及至1953年忠诚老实运动时，已认识到共产党是持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策，就如实交代了此问题。此后也获得